

您的位置：比较政治研究网>理论探索

## 民主何以成功，何以失败？

作者：谭君久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第三辑》，2012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第三辑》，2012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简介：谭君久，武汉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对智利、波兰、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在2010年所发生的事件的比较观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第一，民主必须有最低程度的社会共识，撕裂的民族，分裂的社会是搞不好民主的。第二，民主的正常运转需要法治来保护，需要公正的司法。第三，遵守规则，维护秩序，才可能搞好民主。第四，民主需要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谋一党之私，取一家之利，将破坏民主的根基。第五，民主需要和解与妥协，一味报复将断送民主的机会和前景。

关键词：泰国红衫军；智利；波兰；吉尔吉斯斯坦；民主

### 一

2010年3月13日，各大报纸的国际版面同时刊登了两条消息：一是泰国“红衫军”进军曼谷，另一条是智利新总统在强余震中宣誓就职。

2月27日，智利南部发生里氏8.8级大地震。此前不久该国刚举行了总统大选，这时离新老总统交接只有12天，当选总统皮涅拉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即将卸任的总统巴切莱特夫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随后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并呼吁民众冷静，互相帮助，度过难关。次日，候任总统皮涅拉现身后立马表示，新政府就职后将全力投入重建工作，并以当选总统身份视察灾区，就救援工作与巴切莱特政府沟通。但是，新老总统顺利移交权力吗？后来的事态发展说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新老总统之间联络畅通，配合默契，权力交接的准备也有条不紊的进行。3月11日，智利国会的所在地、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的国会荣誉大厅，总统权力交接式如期举行，当选总统皮涅拉宣誓就职。可是，就在就职仪式过程中，发生了大地震以来最为强烈的一次余震，震级达到7.2级，就职现场只见房屋晃动、吊灯摇曳，但是，新老总统表现镇定，谈笑自若，皮涅拉镇定地宣读了誓词，巴切莱特夫人则向皮涅拉递交了象征着权力的红白蓝三色的总统绶带，现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皮涅拉开始宣读他的内阁成员名单。长长的政府各部部长名单还没念完，又是一波强震。整个仪式不失严肃热烈，但又平淡低调，为了表示对地震受害者的悼念和尊重，就职仪式规模很小，原定的晚宴也改为简单的午餐。宣誓就职仪式结束后，已是总统的皮涅拉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该是干活的时候了”，接着就在余震中发布了他的第一道总统令，下令将沿岸居民迁移至地势较高的地方，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海啸。皮涅拉的镇定和果断增强了人们的信心，智利《信使报》上周末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新政府有能力应对今后任务。[\[1\]](#)

皮涅拉就职的当天晚上，地球的另一边的曼谷已是3月12日上午，“红衫军”开始在曼谷市外围集结，反对派发动了号称百万人的反政府集会活动。到14日，曼谷出现一片红海，红衫军向总理阿披实发出最后通

牒，要求解散议会并重新选举。而政府方面则是如临大敌，阿披实只得躲在陆军11步兵团的兵营坐镇指挥。由于担心群众示威失控，曼谷许多商家停止营业，与国会大厦仅一街之隔的动物园也担心受到影响，将部分大象、鹤、袋鼠等动物疏散到了外地，还储备了可供10天之需的动物食物。真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这场骚乱愈演愈烈，红黄双方剑拔弩张，中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闹剧。期间，尽管阿披实曾抛出和解路线图，红衫军代表也曾走到谈判桌，却一事无成，终于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持续了69天的骚乱，造成88人死亡，1885人受伤。[\[2\]](#)在阿披实政府方面动用武力之后，5月19日泰国军警开始对曼谷商业区的“红衫军”营地进行清场，泰国局势才终于恢复了平静。但据泰国智库泰华农民研究中心估计，这次骚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低于1,380亿泰铢，而政局动荡给泰全年经济造成的损失或达2330亿至3650亿铢。[\[3\]](#)

无独有偶，正当泰国的动荡如火如荼之时，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和多个城市 and 地区于4月6日开始发生大规模骚乱，两天后反对派示威者即先后占领了议会大楼和总统府，宣布接管政府权力，总统巴基耶夫被迫飞离首都，随后流亡白俄罗斯。反对派随后成立以前外长、驻英国大使、2005年“郁金香”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奥通巴耶娃为首的临时政府。4月26日，临时政府公布新宪法草案，宣布将于6月27日对新宪法进行全民公决，10月10日举行议会选举。但是，骚乱并没有停止。4月19日晨，首都比什凯克近郊再次发生大规模抢劫行为，临时政府不得不派出四辆装甲车开入维持秩序。5月13日，前总统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先后占领吉南部的奥什、贾拉拉巴德和巴特肯3个州的州政府大楼，次日，临时政府与巴基耶夫双方的支持者在贾拉拉巴德州甚至发生交火。截止6月16日，仅南部骚乱就已导致187人死亡，1918人受伤。[\[4\]](#)所幸的是，在6月2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有72.3%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九成多的投票者对新宪法草案及相关法律投了赞成票，奥通巴耶娃获得过渡时期临时总统的合法地位，三个月后顺利举行了议会选举。

令人震惊的是，就吉尔吉斯斯坦陷入骚乱没几天的4月1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在前往俄罗斯参加“卡廷森林”事件70周年纪念仪式的途中，其乘坐的专机在俄罗斯摩棱斯克机场附近坠毁，机上96人无一生还，除总统本人遇难外，同时遇难的还有总统夫人、议会两院副议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军队总参谋长和海陆空三军的副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波兰央行行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政界、军界的高级领导人。毫无疑问，这是全球迄今为止导致一个国家的高层领导遇难人数最多、损失政治精英最为惨重的一次空难事件。然而，在如此严重的政治灾难面前，波兰国家、政府和人民表现了惊人的安定和秩序。首先，下院议长科莫洛夫斯基依照宪法于当天宣誓就任代总统，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并承诺将就提前的大选的具体日期“充分听取其它政党的意见”。与此同时，遇难的政府和军方高级领导人的职权，都有条不紊地由法定的官员接替。高级军事将领的职权，由他们的副官在第一时间按照预案接任。此前的大选中同一政党同一选区、得票数居第二位的候选人，也依法接替了遇难国会议员的席位。随后，波兰政府保持了正常的运转。中央银行行长遇难后，此前的副行长接替，4月10日正是周末，周一银行开业时，中央银行一丝不乱，履行着法律规定的一切职能。尽管失去了副部长，波兰外交部的运转依然正常。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相关负责人说，波兰外交部24小时保持与各国使团的联络，效率甚至比平时还要高很多。[\[5\]](#)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波兰的各派政治力量表现出了对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总理图斯克与遇难的卡钦斯基总统本来分别属于左翼的公民纲领党和右翼的法律与公正党，但是，听到卡钦斯基专机坠毁的消息后，图斯克总理失声痛哭，立即从格但斯克赶回华沙，紧急召开部长特别会议，讨论相关善后事宜，随后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波兰政府将会正常运转和工作，并呼吁所有波兰人尊重全国哀悼并注意合适的言行。正如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对媒体所表示的，在巨大的悲剧面前，“我们团结在一起，不分左右”。[\[6\]](#)

## 二

智利、波兰和泰国、吉尔吉斯斯坦四国，都属于所谓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它们在2010年经历的事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民主的成功与失败的样本。

智利和波兰毫无疑问是民主获得成功的例子。国家领导人如何产生和更替，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既包括如何选举和更换领导人，也包括而当领导人因各种原因缺位(病逝、遭弹劾、遭遇意外)的时候，如何产生新的领导人。尤其是在领导人突然遭遇不测的紧急时刻，是否能够迅速确立新领导人并保证政权的顺利运转和国家局势的稳定，当一个国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时，是否能够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波兰之所以能做到大难不乱，能够顺利实现国家权力的转移，得益于宪政民主的确立：一方面，形成了



宪政民主的框架。根据波兰1997年的《宪法》，波兰是一个法治的民主国家，基于分权制衡的原则，行政权集中在总统和部长会议即内阁，立法权集中在两院制的议会，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并且设立了宪法法院。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事务中保持中立。实现了司法独立，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保障，波兰所有的政党组织，都接受法律的约束。不仅仅体现在《宪法》原则上，而且体现在现实政治之中。而这次波兰总统专机坠毁之后，正是这个宪政体制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波兰从1989年至今波兰已经经历了四次总统选举和五次议会选举，经历了多次政党轮替，没有出现比较大的政治危机，也没有出现所谓的“颜色革命”。政治人物、各个政党以及广大民众已经习惯了政权在左右之间轮替的政治生态。即使是过去的执政党也似乎认识到：民主并不可怕，在这种民主宪政的体制下，它们也一样享有赢得政权的机会。[\[7\]](#)所以，波兰的政治转型是比较成功的。

回顾近几十年来智利政治发展的进程，也是耐人寻味的。1973年，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右翼军人推翻了阿连德总统的社会党政府，开始了长达16年的军事独裁统治。1989年，举行多党选举，开始了军人“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1998年皮诺切特交出军权，作为终身参议员进入国会，“民主过渡”进程基本完成。自1989年以来，智利政局稳定，中左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连续执政20年，历经四届政府。但是，这次地震发生前一个月的全国大选中，执政联盟的候选人、前总统弗雷却遭到失败，右翼反对派联盟候选人、亿万富翁塞巴斯安·皮涅拉以52%的得票当选总统。选举的结果意味着智利将改变颜色，结束中左派联盟连续执政的局面。在某些人看来，大地震也许给了执政左翼联盟一次绝好的机会，实行紧急状态，停止权力交接。但是，在民主体制下，通过政府的更迭来实现国家政策的转向，意味着适应形势的政策调整，意味着政策的与时俱进，因此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没有这种更迭和转向，反而是不可思议的。而对于交出权力的一方来说，则意味着一次政策的反思，经过反思和调整，他们将获得的是下一次获胜的机会，因此下台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自然是民主失败的例子。泰国所呈现的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长期把持政权的军人集团逐渐退出政坛，形式上实现了多党竞选的议会民主。但是，国王依然享有举国至尊，拥有绝对权威；党派斗争异常激烈，常常闹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结果不得不通过通过军人在国王的支持或默许下发动政变来收拾残局，在军政权的主导下重修宪法，经过了重新“政治洗牌”后举行新的大选。然而新的民选政府往往又会陷入新一轮的政治恶斗，导致新的动荡和新的政变，国家和民族陷于万劫不复的周期性动荡之中。

这一轮的动荡起因于他信的政敌与他信之间的恶斗。2001年2月，他信率领他所创立的泰爱泰党赢得全国大选并担任总理，实行铁腕禁毒，致力于消除贫困，依靠推行农村医保和补贴农民，使底层民众成为支持他的铁票，并最终将泰国带出亚洲金融危机，并且使泰国一跃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5年获胜连任。但是，一些反对他信的政治组织联合组成民盟（人民民主联盟），2006年6月，纠集起“黄衫军”发动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一手挑起了持续至今的危机。由于社会动荡，陆军司令颂提于2006年9月发动军事政变，他信被赶下台。但是，2007年12月，在根据军人政府主导制定的新宪法举行的全国大选中，他信支持的人民力量党在12月的大选中再一次获胜领先，并与其他几个政党组成六党联合政府。但是，不到半年，“黄衫军”再次发动反政府示威，先后导致人民力量党的沙玛和颂提两位总理被迫下台。经过几番折腾之后，属于人民民主联盟的民主党党首阿披实于2008年12月当选新总理，组成了新内阁。他信及其支持者自然不可能轻易地接受这样的失败。泰国的动荡政局自此陷进了一个走不出的“怪圈”。2009年4月，支持他信的力量组成“反独裁联盟”，并组织起“红衫军”在曼谷进行反政府示威活动。示威不久演变成骚乱，造成人员伤亡。4月11日，由于示威者在泰国帕塔亚市的干扰和破坏，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本应于当天开幕的东盟峰会，已经到达的各国领导人也只好在泰国领导人的致歉声中打道回府。

正如有人所说，泰国的乱象表明的是“泰式民主的困境”，可是，也有人以泰国为例，证明民主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好东西。可是，什么是“泰式民主”？准确地说，它是一种“不及格的民主”。实际上，泰国的某些政治家根本就没有打算好好生地搞民主政治，“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林明达曾经声称，“在泰国，民主体系不起作用。”号称“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不相信民主，这的确是件怪事。正是由于他们宁愿选择街头斗争，而不愿意采取民主政治的常规途径，才造成了泰国的乱象。泰国的乱象并不能说明民主本身不好，而是民主不及格的人用错了民主。好比一个人数学考试不及格，连个简单的计算都搞错了，因此造成了巨额的损失，难道我们因此就说数学是个坏东西吗？于是就号召世人都不要学数学了吗？应该说，是数学不及格的人的错，而不是数学的错。显然，泰国的民主乱象，是泰国的政治家们的错，而不是民主的错。

对智利、波兰、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在2010年所发生的事件的比较观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民主必须有最低程度的社会共识，撕裂的民族，分裂的社会是搞不好民主的。最低程度的社会共识是实现民主的基础性条件，这种共识既存在于政党之间，也存在于民众之中。以波兰为例，在转型的20年时间内，波兰的政府基本上左右两翼的政党轮流执政。但是左右翼在波兰的内政外交上，基本保持了最低程度的社会共识，就是波兰一定要建立民主政治，一定要建立市场经济，一定要融入欧洲。虽然左右翼的政治力量，在工作的重点上有所差异，但是基本的目标非常一致。20年来，波兰的转型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根据波兰民意调查中心的几次调查表明，总的来说，波兰人民是非常认同这20年的转型，认同转型的方向和转型所选择的道路的。这几次调查提出的问题是“1989年波兰的制度改变是不是值得”，1994年选择“值得”的为40%，1999上升到72%，2009年达到了82%；选择“不值得”的，1994年为28%，1999年为17%，2009年下降到8%。

巨变和转型之后，波兰的产业工人实际上承担了很大的牺牲。传统工业部门事实上已经衰败了，很多工人失去了工作，1990年代中期失业率一度达到了20%，波兰的工人阶级，为波兰的转型做出了巨大牺牲，承担了巨大的代价。那么，为什么波兰的转型能得到人民大多数的认同呢？首先，国家生活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从而为他们的后代争取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转型以来，波兰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欧洲是快的，长期保持了年6%的增长率，在加入欧盟之后波兰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欧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而且2009年在整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条件下，整个欧盟除了波兰之外都陷入衰退，这一年波兰经济仍然实现了1.7%的增长。因此，有人把波兰称为“中欧之鹰”，也有人称之为“欧洲经济小龙”。

更重要的是，波兰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在波兰的转型中，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政治上转向宪政民主。从过去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支撑波兰经济的是75%以上的民营经济，即私有企业，在私有企业中就业的人数也超过70%以上。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国有资产的大量转移，国有化向非国有化的转移，就有可能出现大量的腐败，如何规避转型过程中的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成为转型国家无法绕过的关节。波兰通过私有化法来严格限制国有企业出售的条件，并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从而把私有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降到最低，使之成为一种“正常国家的正常腐败”。这就说明，宪政民主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备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也存在“正常国家的正常腐败”，一部分群众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却能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但是没有出现不可忍受的逼得人一个接一个跳楼的两极分化，没有造成社会的撕裂，人们对改革的基本面是认可的。

可是，在泰国，占泰国6300万人口约70%的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与占人口约30%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等两大社会力量之间严重对立，这正是政局动荡轮回、政坛不断洗牌的深层根源。在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里，特别需要政治家和社会精英的远见、智慧和理性。可是，泰国的一些政治家却都反其道而行，热衷街头政治，放任暴力，挑唆鼓动，火上浇油，搞得红黄两股力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而在这样一个利益分化严重的社会里，民主是很难有效的。同样，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矛盾也非常激烈。

面对激烈的利害冲突和社会分裂，各方面的政治家应该从民族和国家利益出发，努力弥合分歧，减少对立，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冲突，解决利益纷争。南非的曼德拉则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在种族主义政权统治时期遭到残酷迫害和长期监禁，在获得自由之时所面临的是一个社会严重撕裂的国家，但是，他在实现了争取自由的胜利后及时地确定了实现民族和解作为新的奋斗目标，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国家民主转型的历史进程。曼德拉在获得自由后曾经发表谈话说：“在那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由于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长期统治，造成了惨烈的种族对立和社会分裂，针对南非的这一特殊国情，曼德拉表示，“我为反对白人种族统治进行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专制而斗争。我的美好理想是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让黑人和白人成为兄弟，南非才能繁荣发展。”曼德拉以他宽大的胸怀化解了种族的仇恨，与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共同引导南非人民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实现了南非的和平转型，他本人也与德克勒克共同获得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被誉为“黑白双星”。

第二，民主的正常运转需要法治来保护，需要公正的司法。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宪政的民主，是与法治结合起来的民主。法是什么，就是事先约定的规则。无论是解决领导人的选举和国家大政方针也好，还是在日常政治中也好，都在宪法的最高权威下，依法、依程序来施政与参政，执政者与普通民众都要守法。没有法治的民主，必将反过来破坏民主本身，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骚乱就说明了这点。当然，法治国家并不禁止游行、示威等街头政治行为，但必须有某种限制。民众可以上街游行示威，但不能滥用权利，不能冲击、占领总理府和政府机关、占领机场。街头政治行为必须限制在和平、合法、理性的范围内，街头政治行为也不能无休无止，如果街头政治成为常态，民主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必须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行事，超过范围，便只能导致混乱与无序。当然，避免街头政治的最好出路是为各种利益和意见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在波兰，由于议会已经成为一个公开博弈的场所，利益分歧都可以通过议会政治来调节和化解，1989年以前常见于街头的示威和罢工到今天已经十分罕见了。

就像奥林匹克竞赛一样，任何竞赛和竞争都必须有事先制定的规则，如果没有规则，没有依据规则公正执法的裁判，任何竞赛和竞争都不可能进行。而作为竞争性选举和民主政治的一条重要规则，就是司法严守政治中立，宪法法院更不宜审判政治问题。但是，从泰国这几年的政治进程来看，其司法判决明显地偏袒“民主联盟”一方。2007年底人民力量党再次竞选获胜组阁后，但是，不到半年，“黄衫军”再次发动反政府示威，要求沙玛辞职，示威者一度占领总理府。就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改变了历史。73岁的沙玛原本是泰国电视烹饪节目“尝尝和发牢骚”的知名主持人，他在出任首相后，仍继续主持该烹饪节目，直到两个月后才停止。9月9日，泰国宪法法院宣布沙玛在担任公职期间为私人企业主持烹饪电视节目并收受酬金违反了宪法，并判决沙玛及其内阁须全体辞职。沙玛被迫下台后，人民力量党推选颂猜接任总理。然而，民盟及其支持者依然不依不饶，示威活动愈演愈烈，包围国会大院，占领曼谷的两个国际机场，反政府集会持续近200天，甚至导致流血冲突。12月，宪法法院判决人民力量党、泰国党和中庸民主党犯有贿选罪，予以解散，颂猜被迫下台。凭心而论，沙玛在电视烹饪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纵然有失当之处，也不能成为推翻一个政府、迫使内阁集体辞职的理由。至于接下来宪法法院以贿选罪名判决执政联盟三党予以解散，明显有借司法打击政治对手的嫌疑。另一方面，“黄衫军”包围国会，占领曼谷国际机场，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后来，红衫军如法炮制，冲击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打砸总理座车，导致整个社会和国家陷入了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可见，泰国的治安力量、司法机关和宪法法院不仅没有发挥保护和保障民主的作用，反而充当了打乱民主进程、搅乱政局的推手，使得反他信的势力得以利用司法来达到选举中未能达到的目的。

第三，遵守规则，维护秩序，才可能搞好民主。民主需要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但这种参与必须是守规则的。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按事先约定的规则、以和平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权力斗争。选举一旦结束，无论双方的得票多么接近，胜者的优势多么微弱，失败的一方都要接受这个结果，尊重法律和尊重选民的意愿。这就好比足球场上，哪怕是一个点球，输了就是输了。选举一旦揭晓，胜败的双方就要尽快携起手来为共同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进行合作。可是，在泰国的所谓民主过程中，失败的一方再三拒绝承认和接受选举的结果，尤其是当年的“黄衫军”，占领总理府，占领国际机场，非要闹到合法选举产生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下台，直到更迭政府不可。因此，凭心而论，“反他信”的所谓“民主联盟”是目前这种乱象循环的始作俑者。

民主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运行的，所谓制度，就表现为一整套事先制定的规则。规则一旦制定，制度一旦建立并生效，就必须具有稳定性，频繁地修改规则和改变制度就意味着没有制度，频繁地修改宪法就意味着没有宪法，就会破坏制度本身。在吉尔吉斯斯坦和泰国，宪法都可能随时依掌权实权的领导人的意愿而被修改。2005年“郁金香革命”之后，年，伴随着多次集会和示威游行，吉尔吉斯多次修改宪法，而巴基耶夫也数次解散政府。2006年11月，吉尔吉斯议会通过新宪法，改总统制为议会制，大大缩小了总统权力，由议会多数党来组织政府，总统只能根据议会的提名来批准任命总理。巴基耶夫当然不满意这项改变，在签署这个宪法后便立即组织了修改新宪法的班子。一个多月后，经过激烈辩论议会于2006年12月30日通过了第二个新宪法，半个月后巴基耶夫签署这个新宪法，恢复到阿卡耶夫时代的总统制。但是，围绕政治制度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终于引发了今年的事变。

作为程序的民主，其基本形式之一就是投票，即通过投票来决定选择，基本的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一旦选举结果揭晓，就应该服从，任何胡搅蛮缠、不服气、不认账都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但是，对于少数来

说，应该明白的是，他们的机会不在当下而在将来。而要把握机会，最需要做的就是好好表现，即当好反对派。所谓反对派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反对，是建设性的反对派，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国计民生，从而为下一次选举做好准备。民主不是你死我活的政治，而是朝野共存的政治。

第四，民主需要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谋一党之私，取一家之利，将破坏民主的根基。他信担任总理期间，应该说是政绩斐然，他信也因此成为了泰国第一个做满四年任期的总理，而2005年获选连任，也成为第一位通过选举连任的总理。但是，他信未能恰到好处地利用自己的政绩带来的声望，带领国家走向一个繁荣、和谐、民主的社会，而是变得过分自信，独断专行，任人唯亲。2006年1月，他信家族将其控股的西那瓦集团的49.6%的控股权出售给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此番轻率的举动授人以柄，反对派乘机发动大规模群众游行，要求他信下台。在此情况下，他信宣布解散国会下议院，重新大选。虽然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4月2日的选举中再次获胜，但是，由于多个政党同时抵制大选，特低的投票率导致政治僵局。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信只得在觐见国王之后宣布不再担任总理职务。但是，僵局并未因此打破，6月“黄衫军”发动大规模示威，最终以颂提发动的政变收场。反他信的民主联盟的核心领导人物林明达，原本是他信的朋友，与他信称兄道弟，曾经称赞他信是“泰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理”。林明达原以为可以凭着与他信的私人关系可以从政府得到好处，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且向他信伸手借钱遭到拒绝，便反目成仇，林明达从此与他信势不两立，不断组织集会，直接引发了2006年的军事政变，造成了泰国社会的动乱。

作为民主政治下的政治家，首先要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要具备担任民主领导人的胸怀和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就表现为获胜的多数必须有善待少数的气度，失败的少数应有服从多数的雅量，既要赢得起更要输得起。民主制度下没有永远的赢家和输家。如果政党和政治家没有这种修养，没有这样的雅量和气度，是搞不了民主的。而从智利和波兰在巨大灾难后的权力轮替和接替中，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民主需要的是负责任的政治家，需要不同党派的政治家对国家、对民族的共同责任，不同政治主张的政治家和政治力量之间的信任、合作和尊重。任何一个党派的政治家都不能为了一党一己的私利而置国家利益、置国计民生而不顾。

第五，民主需要和解与妥协，一味报复将断送民主的机会和前景。民主本身也是一种妥协机制。民主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存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社会力量（集团），存在异见是正常的，没有异见才是不可思议的。但民主不是放大异见，而是要存大异，求大同。如果相异的利益、相异的群体只盯着分歧和冲突，不懂得谋求妥协与和解，就会加深社会分裂。而一个没有妥协与和解的社会，自然是搞不好民主的。

当年，他信及其后继的总理一个接一个地被赶下了台，“黄衫军”及其幕后支持者如愿以偿。但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阿披实政府先天不足、政治基础非常虚弱。阿披实上台后倘若能审时度势，适可而止，对被赶下台的他信及其追随者多加安抚，对一度受惠于他信政策的基层民众也施以恩惠，泰国的社会也许可以逐步走向和解，政局也可能逐步趋于稳定。可是，阿披实政府和民主联盟势力完全不谙安抚人心与政治妥协的道理，而是奉行“成王败寇”的逻辑，借助于掌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恨不得对他信及其追随者斩尽杀绝，尤其是对曾经政绩卓著、颇有口碑的他信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信下台后，反他信的势力就通过他们控制的机构陆续冻结了他信夫妇的多个银行账户，查封资产总额达到23亿美元。今年2月26日，泰国大理院（最高法院）裁决没收他信在国内的6成资产约合14亿美元，把他信和他的支持者逼到了“悬崖”，“红衫军”不得不绝地反击，引发了今年的动荡。

与泰国形成对照的是，智利在恢复民主以后，对曾经既创造了智利的经济奇迹、又创造了“智利历史上最恐怖的时期”的皮诺切特给予了司法豁免权，在其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尽管官司缠身、诉讼不断，皮诺切特依然能够得到政府提供的周到治疗，最终在平安中结束了他颇多争议的一生，而当时的左翼政府还以前军队总司令的礼遇为他举行了葬礼。

如果再看一下南非的曼德拉和韩国的金大中，同样可以从中得到启发。金大中虽然在朴正熙时期数次被捕，不是被监禁就是生活在被软禁的环境中，全斗焕上台后，金大中甚至被军事法庭以“阴谋内乱罪”判处死刑。所以，反对他的人曾经预言，一旦金大中掌权，必将进行无情的政治报复。但是，在1997年当选总统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金大中就发表声明：绝不会进行政治报复。在他当选后的第四天，还在监狱中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被宣布特赦。金大自在公开场合表示，两位前总统当年毕竟对韩国的经济起飞有过重大



贡献，而且在产业界有广泛而深厚的联系。让他们获得自由有助于整合国家，集中力量挽救经济。结果，韩国独裁统治时期的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三位前总统和金大中曾经的盟友前总统金泳三共同出席了金大中就任总统的典礼。可以说，曼德拉和金大中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曾经为了反对独裁统治而不屈不挠地斗争过，更在于他们在获得自由、取得国家权力后以宽阔的胸怀宽恕了镇压过、折磨过他们甚至曾欲置之于死地的前政权领导人。这表明，他们是真正负责任的政治家，不是陷在痛苦的个人记忆中不能自拔，而是超越自我，真正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正是由于他们的坚韧、卓识和宽容，才使得他们自己的国家顺利地度过了最艰难、最敏感也是整个社会最撕裂、最脆弱的岁月，实现了民主政治的转型。

在当下的中国，对“民主”似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对民主很急切，巴不得中国的民主马上就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或者把某种具体的民主模式当成了典范。另一些人则对民主很不以为然，尤其是把泰国等地的乱象归因于民主。其实，不管哪一方，首先要使自己学会在民主制度下生活，这就是善待对方，学会求大同存大异，要去掉“唯我独尊”的劣根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使自己文明起来，学会妥协，学会以现代文明的方式对待和处理社会纷争和政治分歧。同时应该多看看一些国家的经验，然后再来思考民主的利弊，思考中国的民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民主模式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如果我们自己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那就应该努力创造这种条件，取得享有民主的资格，而不是自暴自弃，以此为由而放弃对民主的追求。

---

[1] 陈晓航：《“重建总统”面临多重考验》，载《人民日报》，2010年03月13日，第3版。

[2] <http://www.chinanews.com/gj/gj-yt/news/2010/05-24/2300982.shtml>，中新网5月24日电，2010年6月10日查阅。

[3] <http://www.chinanews.com/gj/gj-yt/news/2010/05-26/2306328.shtml>，《综述：分析指政局不稳拖累泰国经济》，中国新闻网，2010年5月26日，2011年5月31日查阅。

[4] <http://www.chinanews.com/gj/gj-yt/news/2010/06-17/2346281.shtml>，中国新闻网，2010年6月17日，2011年5月31日查阅。

[5] 胡贲、史哲：《当一个国家失去总统》，载《南方周末》，2010年4月15日，A5版。

[6] 《波当局紧急善后》，新华社华沙4月10日电。

[7] 1995年，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兼民主左翼联盟主席克瓦涅夫斯基战胜瓦文萨当选总统。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990年初，后来成为民主左翼联盟的一部分，后者则被视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的延续。

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如果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

[\[关闭窗口\]](#)